

文學創作者應守「真誠」的態度

史思明

——國片小說改編劇本的一個特例

一、「寧靜海」、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孰先孰後？

國片採用小說改編電影的現象由來以久。早期，中影公司連拍了幾部由瓊瑤的作品改編的電影，如「婉君表妹」、「亞女情深」等，製作的態度尚稱嚴謹，風格亦清新。以後由於電影商人的投機，搶拍、濫拍「瓊」片，出品粗糙，以致該類電影的發展每下愈況。「瓊」式電影，雖然曾經有國內著名導演如：李行、白景瑞、陳耀圻等執導，導演的技巧雖好，也只能予人「死馬當活馬醫」的印象；這實源於故事內容缺乏深度。目前，一般影劇記者的報導指出，「瓊」式電影已沒落了。一些還有興趣拍文藝愛情片的電影商人遂試圖放棄「三廳電影」（客廳、舞廳、咖啡廳），而讓劇中戀愛的男女主角「回歸鄉土」。即將推出的「寧靜海」，即由青年作家小野編劇。小野編「寧靜海」既不完全放棄「三廳」，同時也沾到時髦的「民族」、「鄉土」的邊。

一般說來，電影商人與作家合作，或借助作家構思故事，或利用作家與作品的發行為電影打知名度。兩者合作的方式有以下幾種方式：

- 一、只要作家掛名原著。改編劇本另請專業編劇家。這是因為電影注重影像的表達，與小說寫作不同。
- 二、由作家本人親自改編原著，則作家同時掛名「原著」、「編劇」。通常導演等工作人員從旁指導作家，提出刪改、增減的意見。

三、由電影公司先提出故事大綱，交由作家寫成小說，在報紙上發表，給社會大眾造成印象，打開電影的知名度。例如：「成功嶺上」、「源」。前者即由小野執筆寫成小說「擎天鳩」在聯合報副刊發表。電影劇本實際執行者為導演組人員。該片賣座的因素在於導演組人員善於刻劃劇中人物，以及善於掌握戲劇效果；這些都是小說中所沒有的。

電影商人利用作家及作品見報打知名度，這是可以諒解的。兩大民營報已有陳規，不做電影廣告的生意，僅刊登電影上映的時間表。讀者如果稍微留意，可以發現，一些電影商人買下兩大報的廣告欄，做著原著或是電影主題曲的唱片廣告；這是變相的電影廣告。通常一則報紙電影廣告要花數萬元的廣告費。「汪洋中的一條船」上映後，社會上的反應極佳，各報都有讚譽的文章，這種免費宣傳的盛況，真不知羨煞多少電影商人？

最近民營永昇公司拍攝的「寧靜海」，由林福地導演。片子殺青，廣告打出來了，預計五月上演。「原著」正好在上演前夕在聯合報副刊連載三天（五月六、七、八日）。編輯按語指出，「拿出作品來！」是該報紀念「五四」運動六十周年連串的討論文章後的下一個文學活動。小野的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有幸成為「拿出作品來！小說的出發」第一篇文章。現在，讓我們就電影、小說的內容來看一看，它是否具有「五四」的精神？它是否符合編者按語：「拿出作品來，見證我們的時代！充實我們的精神！豐富我們的文化！」？

「寧靜海」、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這種先見電影，才有小說，在國片採用小說改編成電影一章中成為特例。孰先？孰後？恐怕只有作者和電影商人心裏明白，外人則不得而知。

二、唯利主義的電影「寧靜海」

電影「寧靜海」的開始是窮學生夏曉南與富家女姚莉在電梯上巧遇，姚莉即喜歡上夏曉南，邀他搭便車，從此愛他愛到底。

中間穿插，夏曉南去精神病院探望因生意失敗而精神失常的父親，認識嫻慧美麗的護士葉文英。葉文英與夏曉南同校，是護理系實習生，熱心社會福利工作，並曾在夏曉南病危時輸血給他。夏曉南左右逢源，從姚莉處得到愛情，靠姚父的提拔少年得志，事業有成，與姚莉訂婚。葉文英懷了孕，被夏曉南怒斥、拋棄。夏曉南向葉文英狂吼：「妳想用懷孕來威脅我？」這是他對救命恩人、愛人的態度。

電影廣告寫：將本片獻給天下的母親；事實上本片充滿對母親的輕視和污辱。夏母為生活所迫，當酒家女賺錢付丈夫的醫藥費，得不到子女的諒解。僅在片尾時，夏曉南臨時改變主意要認葉文英所生的孩子，同時也才認他的母親（夏母照顧未入門的媳婦和孫子）。

電影裏，夏曉南是個狂傲、自私的大學生。他因為自卑而編織謊言，對姚家人佯稱他的父母死了。當他的未婚妻發現他藉工作之便，南下找葉文英母子，於是請父母開了張一百萬元的支票，要夏曉南交給葉文英，從此斷絕關係。他們既不驚訝夏曉南始亂終棄的行爲，也不責備他。夏曉南拿著支票也不覺得羞耻；似乎一切的發生都是合理而自然。編劇以夏曉南為世界的中心，即使他作惡，「所有的人都愛他」；這絕不能使觀眾認同，特別是飾演夏曉南的男演員馬永霖在電影裏只像個流氓、小太保，毫無氣質。

全篇電影的故事刻意繞著「寧靜海」打轉。「寧靜海」是姚莉為她家產業之一的一個小湖所取的名字，她初識夏曉南就帶他去湖邊。夏曉南的姐姐曉宜被男友羅漢彬遺棄，投「寧靜海」而死。姐姐的男友從美國回來（他原來要帶曉宜去美，臨時變卦。後來因為美國與中共建交，他一氣之下就回國），來到「寧靜海」憑弔，被夏曉南痛揍一頓。夏曉南却不為自己也做了始亂終棄的事覺得慚愧。他最後之認親生子，是「臨時起意」。孩子在牙牙學語，偶然發了個「爸爸」的音，使他甚為驚訝，他連忙說：「再叫一次『爸爸』，爸爸就不走了。」旁邊的人，各有不同的反應，姚莉發急，不希望孩子叫「爸爸」。葉文英發急，希望孩子叫。連躲在門後窺看、不得諒解的夏母也發急，直唸著：「叫啊！叫啊！」電影發展至此，不禁令人嘆息編劇水準之低落。孩子不叫，夏曉南轉身要走，突然地，孩子叫了一聲「爸爸」，夏曉南就不走了，抱起小孩，向母親下跪。一個為

人子、爲人父者，是否盡到道德上的責任，只憑偶然的，從不知生父爲誰的稚童一聲牙牙學語，而作決定；這是怎樣一種諷刺、殘忍的人性？

編劇要塑造一個人人皆愛的白馬王子夏曉南，以他嘴裏吐出外國著名音樂家的名字，來表現他「有水準」；既薄弱又無力。夏曉南口口聲聲講「骨氣」，所作所爲却是最沒有骨氣、最無恥。而電影裏，人人都愛這樣的夏曉南；我們看了只覺得荒唐。姚莉自稱是「天才的音樂家」，所奏的鋼琴曲、所哼的曲子，毫無美感、韻律可言。羅漢彬出國匆匆，回國匆匆，他突然冒出「美國和中共建交，我很生氣，就回來了。」，這是教條主義作祟，既不能讓觀眾感到愛國的情感，只覺得唐突。夏曉南頗受姐姐曉宜的看重，但是曉宜的觀念傾向文憑主義，只要他唸書，不准他工讀，聽說他工讀就擱他耳光，這時做弟弟的就向姐姐下跪，姐姐又抱着弟弟哭成一團，用手摸他的臉頰問：「打痛了嗎？」類此關於感情表達的戲，相當地生硬而失敗。整個說來，本片水準甚差，不值得文化圈人士爲之作宣傳。

三、曖昧不清的小說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

在小說裏，「蝦米」是夏曉南童年居住在新竹海邊漁村「海口」時的綽號。夏曉南與葉文英青梅竹馬，唸大專時偶然重逢。倆人重逢時，夏曉南正暗戀着他工讀時爲人家打蠟的一個富家小姐姚莉。夏曉南很爲自己的貧窮自卑，爲兩個父親互鬭、廝殺雙雙死亡的家世而自卑。他雖然自卑，表現於外的却是一種故作姿態的驕傲。他諷刺姚莉家裏的飲料也西化，諷刺姚莉作的曲子是校園歌曲，比不上「史特拉汶斯基」、「巴托克」。他向姚莉作出「自以爲性格的男性笑容、理直氣壯地盯着她」。姚莉也喜歡他。從他打蠟時「晶亮澄紅的霞光是他握着打蠟機的臂膀的膚色」，到「年輕人頭偏了一下，霞光映上他半張臉，竟是面有清晰線條的山脊，韻緻天成。」；敘述着姚莉對他一見傾心。姚莉到美國參加音樂會，臨行前曾請傭人交一封信給夏曉南，因爲沒有

寫地址，而陰錯陽差。待她歸來，倆人重逢時，他的身邊還有個葉文英。他心裏想的是「希望姚莉擁抱他」，嘴裏却向姚莉介紹「葉文英是我的未婚妻」；使得姚、葉都很吃驚。這是本文的關鍵所在。夏曉南「搞不懂自己做了什麼？說了什麼？」、「剛才幾句話只想在興頭上澆個冷水罷了」。他分明是說謊，却又向葉文英扯了個大謊：

「我是講真話，沒有賭氣。阿英，答應我，讓蝦米仔娶妳，我們回去海口老家，你當護士，我找一份固定的工作，我們要生一羣孩子，蝦米一號、二號……六號、七號……」

文中的「回歸鄉土」就是在這樣說謊的情況下臨時成立。

「蝦米」是夏曉南的綽號。「蝦米一號」最初出現，是夏曉南自製的一個小帆船模型，是用火柴盒、三夾板、扣子等堆砌起來。夏曉南拿着它與姚莉到「寧靜海」去玩，後來他把它送給了她。「蝦米一號」後來出現時，是夏曉南對他未來孩子的稱呼。讀者不知道，篇名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指的是什麼？模型帆船？未出世的壯丁？

四、拿什麼樣的作品來「見證我們的時代」？

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中，夏曉南諷刺校園歌曲。讀者不知道它指那一類的校園歌曲？校園歌曲有披着鄉土外衣的西化民謠，有發揚民族精神的鄉土民謠。作者含糊的詞句，也不過是假鄉土之名而行詆譭鄉土之實。這篇文章，本質上是沉浸於自戀，自瀆的頹廢意識，譬如作者寫了一段夏曉南在夢中蹂躪姚莉的身體，且還如「過河卒子」、「忘了其他一切」；這還是在夢中以亂行自許的。然而，在現實中，夏曉南只有自艾自憐。振奮精神的建立和宣揚，毫無根基。

姚莉去了一趟美國，回來坐在飛機上看到臺北的山土景緻，她想要「站起來擁抱」；站在她面前的夏曉南

只是「想拉她手而不敢拉，在夢中可以隨心所欲飽餐她」，盼望着她「擁抱他」。姚莉說，不知道自己成熟的什麼？夏曉南說「要學會看清自己」。夏曉南決定「回歸鄉土」後，還不免讚美「姚莉是天才，蝦米仔只配替妳打蠟」；顯見回歸鄉土並非基於愛鄉土，而是因為高攀不上都市的榮華富貴，仍不捨「仰之彌高」的卑微心態。從這裏唱出「民族」、「鄉土」之歌，不禁令人憂慮這是在沙灘上蓋高樓。一方面，以「民族」、「鄉土」為化粧品粧飾文章，同時在文章中散佈頹廢意識，這是欺世盜名，是架空的「民族文學」。

我們現處的時代，從某方面來說，是個物質腐化人心，功利主義猖獗的時代。從另一方面來說，是要忍辱負重、自覺、自立的時代。拿什麼樣的作品來「見證我們的時代」？這要看作者的認知、認同是什麼？總結地說：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不曾繼承「五四」愛國、救國的民族主義精神。如果它也見證了我們的時代，那也只是見證商業文化污染了文學創作的一面。

五、混淆視聽的「一魚兩吃」不可取

烹調裏的「一魚兩吃」，本質上還有「一條魚」的存在。電影「寧靜海」和小說「揚帆、蝦米一號！」雖然人物相同，內容相似，而在主題意義上却是曖昧不清。世界名著不乏改編為相當成功的電影。我們絕看不到電影的「戰爭與和平」中，娜塔莎與安德來公爵、彼埃爾的關係完全混亂，不似原著。「樂聖柴可夫斯基」電影，充份發揮影像的創造，把音樂、音樂家賦予了電影的藝術精神；電影拍攝的成功，使電影工作者有無比的尊嚴，它絕對可以獨立存在，而不僅僅只是靠原著或是靠音樂家之名而出風頭。難道，我們中國人就沒有這種志向來從事藝術創作？而僅僅滿足於浪得虛名及自欺欺人的虛榮？

我們希望：文化工作者對於自身的工作要懷抱相當尊重的態度。文學創作者尤需出以「真誠」，有所為有所不為，如此方不愧於讀者，也不愧於自己。